治国理政新理念笔谈

主持人语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可以说,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如此之近;但毋庸置疑,我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如此复杂的国内外环境。那么,如何认识和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问题、矛盾以及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如何认识和看待我国面临的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在破解这些难题的基础上实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如何认识和贯彻这些新的发展理念?应《北京大学学报》之约,我邀请了经济学院的部分学者从历史与现状、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经济与社会等多个维度,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发展理念的提出背景、重大意义、深刻内涵和实施路径等提出我们的观察与思考,以期为理论界的讨论和政府决策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和依据。

——孙祁祥

第二次转型:由制造业大国向创新型强国升级

夏庆杰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治国理政发展新理念,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大体可分为追赶阶段和自主创新阶段。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处于追赶阶段时,主要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现有技术为主,因而发展目标相对清晰,如铁路、公路、发电站、能源、航空等基础设施建设、重化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等。由于发展目标相对清晰,可以使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体系集中物质、人力、资金资源实现大规模投资,因而可以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当一个国家基本完成追赶型工业化阶段后,面临着向创新型工业化阶段升级的发展瓶颈。在创新型工业化阶段,没有什么现成的技术可以学习了,只能依靠本国的科研力量和投资来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如典型的创新型国家美国那样。与追赶阶段的经济发展目标相对明确相比,创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点不再明确,不知道哪个企业、哪些行业会在技术上有所突破,从而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技术突破点、经济增长点不确定的情况下,一方面需要不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

收稿日期:2015-12-30

作者简介:夏庆杰,男,辽宁新民市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项目“北京城市多维贫困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5JDJGA071)。

即以分散投资风险的办法对应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需要允许和激励众多高新科技企业的出现、发展和壮大,即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实现“广种薄收”。换句话说,在创新过程中需要分散投资风险,也就是不能再集中物质、人力、资金资源等手段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

到目前为止,我国基本完成了追赶型工业化阶段。在完全进入到创新型状态之前,我国经济处于第二次转型状态。第一次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第二次转型是由追赶型工业化国家向自主创新型国家转变,即由制造业大国向创新型强国升级。转型过程中的主要特征是旧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挥之不去、新型经济体已经出现但还不足以支撑整个经济。经济转型过程中最核心的任务应该是改革现有的不适合新型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政府的任务是用经济社会制度安排支持创新型经济,抑制旧经济模式。中国最高决策层完全洞悉中国经济社会所面临的深刻变革的迫切要求,因而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唯有全面创新,中国才能突破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瓶颈。

那么如何成功实现第二次转型使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升级为创新型强国呢?本文第二部分提出以下几点看法,在经济社会制度安排上鼓励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科技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建立为中小企业和高新科技企业融资的金融和资本市场体系,在经济社会制度安排上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便利等。第三部分是总结。

二、建立创新型强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制度创新?

(一)在经济社会制度安排上允许和鼓励大批高新科技企业的出现和发展

创新的最大特点是不确定性,很难预测创新会在哪出现、哪个企业能开发出打开市场的高科技产品或服务。就如同俗话说的:不知道天上哪块云彩有雨。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不过是分散风险、广种薄收。这也是李克强总理为什么号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科技不断进步,产业不断升级,只有站在生产和科技发展前沿的企业家才能感知瞬息万变的变化,因而需要把引领创新和产业升级换代的任务,交给千千万万个企业家而不是政府的经济计划部门。也许很多企业家会犯错误而被市场淘汰,但是只要少数企业家感悟到并抓住国际上经济技术发展的最前沿技术和方法,这些少数先进的企业家就能引领中国走向创新。日本制造业之所以未能转型,正是因为缺乏一批新型具有前瞻能力的企业家①。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由追赶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型,中国需要层出不穷的创新型企业和企业家。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就是中国需要拥有允许、鼓励、支持创新型企业家涌现并能够发展壮大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就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从制度安排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逐步建立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治理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全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二)在社会政治经济架构中允许各种所有制的工商企业和企业家的存在和发展;(三)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市场;(四)大众教育体系提供了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大量白领职工(技术职工、管理和经理人员、销售人员、工程师、科学家、会计师、律师等);(五)产品市场的存在和正常运行;(六)一定程度的产权保护;(七)相对稳定的金融体系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使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 30 多年时间里由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

到目前为止,我国基本完成了追赶型工业化阶段,学习和借鉴外国技术进一步工业化的余地已经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依靠自主创新,由制造业大国向创新型强国升级。并不是所有完成追赶型工业化的国家都能升级为创新型工业化国家。20 世纪 70 年代的墨西哥也是低工资、制造业发达,但是后来这些

① Glenn Hubbard and Tim Kane, *Balance*: *The Economics of Great Powers from Ancient Rome to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3.

制造业转移到了工资更低的东亚,而墨西哥的产业并没有得到升级。没有得到升级的国家还很多,如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的阿根廷、委内瑞拉、乌拉圭、菲律宾等①。上述低工资制造业国家之所以没有像韩国那样升级为创新型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缺乏鼓励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安排。

与追赶型工业化相比,信息时代的创新型工业化需要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在上述追赶型工业化所需的必要条件之外,还应有如下经济社会制度安排:第一,取消繁文缛节,建立便捷的有利于高新技术企业设立和发展的工商税务管理制度。信息化社会的一个重大特点是高技术升级换代速度大大加快,高新技术企业由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的周期也就是三到五年。在这种情况下,高新技术企业实在经不起旷日持久的艰难审批过程,因为也许等漫长的审批下来之后,高新技术已经不再高新了。第二,建设法治社会,保护平民,抑制豪强(如国企、巨型私企和外企等),为从事经济活动的千千万万个企业家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包括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法规和对违法行为的惩罚。第三,建立完备的产权制度。只有完备的产权制度,才能鼓励企业家精神和技术创新,富裕阶层不再移民和把财产转移到国外。第四,建立稳健的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银行体系,特别是能够为高新科技开发企业融资的风险投资行业和资本市场制度。

(二)建立促进创新的银行金融制度安排和资本市场体制

创新型高科技企业的最大特征是其具有的不确定性,或者说高投资风险性。具体说来,企业家或者科技人员有了可以投向市场的科技项目时需要投资。因为此时没人知道这个高科技项目的产品或服务是否能够打开市场,因而投资风险极高。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银行因为高风险而不愿意给该项目贷款。只有对该项目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可以深度参与该项目经营管理的风险,投资家才有可能进行风险投资。中国的风险投资业还处于发展初期,可能还不足以支撑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开发。但是,我们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风险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中国风险投资业的不足。例如,为马云投资的是日本华人风险投资家孙正义,为马化腾腾讯投资的是南非的 Naspers 财团(15 年前马化腾为 50 万美元的投资几乎找遍了中国的投资人,但是没有给他投资,最后找到了南非 Naspers 财团),为百度投资的是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等。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本土的风险投资业在迅速成长,如对神州租车和滴滴打车进行风险投资的据说是中国本土投资人。

假如一个高科技项目的产品成功打开市场,风险投资人会卖掉他在这个高科技企业的股份,得到风险投资的高额回报。到了这个阶段,该高科技企业要想扩大规模,就需要公开发行股票来筹资。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够发达、不够完善,很多企业上市困难。全球化的资本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为少数中国高科技企业提供了融资便利,如中国人引以为荣的联想、腾讯实际上是分别于 1994 年和 2004 年在香港上市筹集资本才发展起来的,阿里巴巴、当当都是在美国上市筹集到了大发展的资本。

由此可见,发展灵活有效的风险投资行业和资本市场,可以说是高科技企业发展的主要先决条件之一。其实风险投资行业还相对简单,那些有大量资金、对风险项目有比较高的鉴别能力的个人和企业,都可以成为风险投资人。但是有效的资本市场相对复杂。中国的股市发展很多年了,但是还不足以支撑中国高科技企业的资本融资需要。2015 年底国务院宣布将在两年内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如果实施得当,这将极大有力地为高科技企业筹集股份资本提供便利。资本市场的发达有助于经济稳定,因为股东不是债主,企业亏损时既可以不发股息,又不用还债,因而经济危机时企业家也不用为躲债而逃跑。

① Scott Rozelle 2015 年 9 月 19 日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行的“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Scott Rozelle (2011), Will China Fall into a Middle Income Trap? Growth, Inequality and Future Instability. http://fsi.stanford.edu/people/Scott_Rozelle/.

我国非国有银行业的发展还处于开始阶段。非国有银行业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根据 Walter Bagehot① 的介绍,早期英国私人银行产生于有信誉的一些企业为其他企业办理异地托收承付业务,在这些企业建立足够的信誉后才吸收客户存款。因而,允许成功而有信誉的私人工商业企业发展银行金融业务是发展非国有银行金融业的一个有效途径。这方面的好消息是国家已经批准成立了五家非国有股份制银行,其中马云主导的网商银行主要针对小微企业客户发放 500 万元以下的贷款,这将是中国创新的重要引擎。

当中国有千百家有效运作的非国有银行及风险投资机构,以及能为企业提供筹资服务的资本市场时,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融资条件也就具备了。

(三)在制度安排上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便利

创新到底从哪儿来呢？工业化信息化阶段的进步是建立在科学技术昌明基础上的。换句话说工业化以来的竞争是科学技术发展上的竞争,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研发部门的科学家们最有可能触及和开发创新技术。因而,国家必须重视科学和教育的发展。自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按照目前每年 700 万人的招生数量,到 2025 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存量将达到 2 亿人。新世纪以来,在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以及各地的吸引海外高端人才计划的支持下,海外学成归国的科学家大幅度增加,其中不乏一些国际知名青壮年科学家回国效力。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对优秀科研项目的资助越来越多,资助力度越来越大。因此,中国已经为科学和技术创新奠定了比较坚实的人力资本和物质技术基础。

尽管我国已经具备了科学技术创新的物质基础,那么为什么还很少见到创新型项目转化为走向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呢？或者说科研成果转化需要那些条件呢？科学家也是人,也需要为衣食住行妻子儿女的生计担忧。因而,解除有科研成果需要转化的科学家的后顾之忧将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转化,例如允许国有科研院所拥有科研成果需要转化的科学家停薪留职,允许科学家以科研成果入股,对投资于科研成果转化的风险投资人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等政策措施。

(四)如何在第二次转型过程中实现稳定经济增长

在第二次转型状态下,一方面要进行创新型经济的制度安排建设;另一方面也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么维持转型状态下的经济增长有哪些办法呢？具体办法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以前高增长下的经济发展措施,如在我国西部不发达地区进行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尽管说我国经济或多或少已经摸到经济发展的前沿,但是还没有真正到达前沿。因而还有一些追赶和模仿的余地。在追赶和模仿的关键战略领域,依然可以采取国有企业大规模科技攻关的模式,突破发展的瓶颈,如高铁、大飞机项目等。第三,我国企业也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如阿里巴巴等,这些企业也会引领中国企业的发展。当创新型高科技企业群体具有了可持续发展能力、高科技企业风险融资机制基本成熟时,或者说创新型高科技企业的数量和质量足以引领经济发展和增长时,中国的创新型经济就基本建成了。

三、总 结

创新的最大特点是不知道创新出现在哪里,因而只能靠分散投资风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实现广种薄收。创新很难,主要创新国家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大多在 1% 到 3% 之间。在完全进入到创新型状态之前,我国经济处于第二次转型状态,即由追赶型工业化国家向自主创新型国家转型,或者说由制造业大国向创新型强国升级。

在第二次转型过程中需要完成以下核心任务:第一,建立有利于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设立和发展的工商税务管理制度。第二,加强法治社会建设,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第三,只有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才能鼓励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避免富裕阶层移民和把财产转移到国外。最后,建立能够为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提供便利快捷融资服务的银行金融体系、风险投资体系、资本市场制度。

① Walter Bagehot, *Lombart Street: A Description of the Money Market*, New York: E.P. Dutton, 1920.